

# 陈嘉庚的民俗观探微

夏 敏

(集美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爱乡思想与他深受集美乡土文化影响有极大关系。这种影响终其一生, 使滋养他的下层文化与其从上层社会习得的精英文化, 在他身上形成特殊的整合, 这突出表现为他对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所持有的极具个性化的民俗态度。

**关键词** 民俗观; 陈嘉庚; 乡土文化; 物质民俗; 精神民俗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指出: “人生活在民俗里, 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 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sup>[1]</sup> 这番话之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也不例外。陈嘉庚身上汇集的浓厚的民俗情结, 构成了他爱国爱乡思想的文化因由。这种爱国爱乡思想本身包含了他那深切的民众感情和乡土情谊。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以国为家的人。其倾资兴学、筹赈祖国的行为并非凭空生出, 它在一定程度上缘自陈嘉庚朴素而深厚的民俗土壤。一方面他要按照民俗生活的惯例去行事履思, 一方面他长住南洋使他有关注异国风俗, 并对乡土中国的诸多民俗进行多重反思。研究陈嘉庚的民俗观, 既可窥见寓居南洋的华侨、华人风俗观念变迁的心路历程, 又可看到民俗文化对嘉庚先生的浸染, 并能为其爱国爱乡思想寻找到文化依据。嘉庚先生的民俗观念是一个醒目的文化特例, 对其间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揭示, 必将成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证。

## 一 陈嘉庚与乡土社会

陈嘉庚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人。从故乡到南洋, 从经商到从政, 从民间社会步入上层社会, 民族生活传统成为流贯于他一生的文化纽带。17岁以前, 他一直生活在集美, 对集美的乡土民情耳濡目染。他的祖父在当地捕鱼, 父亲在新加坡经商, 这也同样是与陈嘉庚同龄的集美人眼中的现实生活。集美这一小小的乡土社会中人们特殊的生活样式, 为陈嘉庚日后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

陈嘉庚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与他自小接受传统中国乡土文化影响有密切关系。9岁以前他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和影响, 9岁至17岁随乡村塾师接受封建私塾教育, “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 为他奠定了初步的国学基础和文言功底。17岁出洋后, 远在天涯的祖国和故乡象梦一样牵系着嘉庚先生的游子之心。在新加坡, 陈嘉庚接触的多半是和他同样经



方文化撞击最强烈的地区。陈嘉庚独特的民俗观的形成，渗透了中外文化碰撞的多种情形。这使他有清醒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劣、短长。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劣处在于缺乏科学文化，它更多地拥有封建时代的文化痼疾。

基于这种认识，他的文化改造策略是：着重以科学、教育和实业来改变中国乡土文化中的封建、愚昧、落后、迷信的东西。他一直提倡良俗，反对陋俗。例如，他20多岁时针对乡民有病求神问卦的做法，特地印发《验方新编》宣传传统医学；1930年集美乡民搞“救月”活动，他指示校方发文介绍“月蚀”的科学道理，反对迷信；1940年他回国慰问，每到一处，都要强调减少繁文缛节，减少应酬费用，赞赏“禁止香烟请客”的做法，对延安上下层人士平等无阶级的“不同礼节”情有独钟；他反对女子缠足的做法，“南洋女侨四、五十岁无缠足人，此风俗改变与华侨社会及报纸宣传有关。我国各处尚见十岁女童缠足，实为意外。”<sup>[2]</sup>（第192页）他对国民陈规陋习的批判已经不仅指向闽南集美这样的“小地方”，而是将其引申为对数千年封建文化积习和恶果在全国乡土社会蔓延的全面清算。

不过，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尽管陈嘉庚试图超越世俗做法与偏见，他却无法脱俗与免俗。他身上既有下层民间文化的印迹，又有上层精英文化的影响，于是在其民俗表现上，就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例。例如他一方面反对烧香拜佛，反对风水，但在自己母亲逝世时，他却不能免俗，仍要遵从俗例。一方面他批判闽南“三十六岁牵孙过桥”为人生幸运的早婚早育陋习，可是自己却也是妻妾盈室，子孙满堂。可以说，在近代中国，陈嘉庚是一个集上下层文化于一身的复杂而重要的人物。

## 二 陈嘉庚眼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简言之，就是世间广泛流传的风俗习尚的总称。陈嘉庚人生后半段介入社会精英阶层，接触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人士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但是陈嘉庚文化素养底层的东西，却是有别于上层精英文化并属于普通民众的民俗文化或民间文化。陈嘉庚尽可能用他习得而来的上层文化观察社会人生，但是作为普通民众出身的陈嘉庚，也可能从他自小习惯于民间的文化来支配自己的言行。认识到后者，我们就不会对他参与祖祠祭祀，筹建归来堂，按“俗例”安葬慈母，在亲自设计的厦大和集美建筑中融入福建民居或祠堂建筑特征等行为而发生疑问了。这进一步成为陈嘉庚所参与的文化建设中，颇具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的成分。从中可以想见民间文化对他本人的重大影响。综其所述，可将嘉庚先生言及的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两个方面：

### （一）陈嘉庚眼中的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指人类的衣、食、住、行以及主体（人）在物质需求中的文化传承活动。

1. 建筑民俗。关于居住（住屋）形式，他亲撰的小册子《住屋与卫生》颇多涉及到中国乡村建筑和新加坡新式建筑的风格差异。他本人一生中也不断与建筑打交道，亲自参与设计出集闽南、南洋与欧式建筑于一体的厦大、集美学村建筑群，人称“嘉庚式”建筑。

2. 服饰民俗。陈嘉庚认为，满清遗留下来的“长衣马褂”应该取缔，因为它们象征着汉民族的“国耻”，他还认为改革服制式样，如果不拟古，也不必刻意效法西方人。“自可研究新式，取其经济与便利”，他本人一身西装，表明他在着装方面的新观念。从经济与便利角度出发，他十分赞赏延安女装，“上短下长，与男装略有分别，便于工作，节约朴素”<sup>[2]</sup>



述中详细记述了他在1940年踏访各地景点的经历。他此来虽非以游览为目的，但顺便游览或各地政府特意安排的游览却也圆全了他在海外一直想遍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心愿。

据其游踪，可知他走了国内许多重要名胜。如在成都踏访供祭孔明的武侯祠及汉昭烈帝祠墓，后往观灌县的古代水利工程，宿青城山，访兰州内供成吉思汗骸骨的高山庙，慕名前往西宁佛寺（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塔尔寺），西安途中瞻望古战场及全国总城隍庙，往观咸阳城外周文王陵、武王陵、康王陵、周公墓、汉武帝陵、卫青、霍去病将军墓、秦始皇陵、马嵬坡唐杨贵妃墓。5月31日晨8时抵陕西中部县行谒祭黄帝陵仪式。<sup>[2]</sup>（第200页）此后又去洛阳关帝庙及龙门石窟，折回四川后探访“名闻中外之峨嵋山”，后过广西赏桂林山水并称“余走过十余省，绝未见有此种石山景致，如是秀丽，真名不虚传。”<sup>[2]</sup>（第285页）进入福建后往观武夷山及九曲江，认为此地风景“不亚于所谓甲天下之桂林”。<sup>[2]</sup>（第310页）

4. 娱乐民俗。陈嘉庚归国慰问期间，许多地方官员均要安排“演剧”活动招待这位远方的客人。看地方戏是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娱乐形式，陈嘉庚对此一应接受并乐于欣赏。陈嘉庚在新加坡领导筹赈祖国活动时也采取演剧等募捐形式。

在民间新兴的娱乐活动中，陈嘉庚最为不满的是跳舞，特别是营业性跳舞，认为它“有百害而绝无一利，直是卖淫变相，为祸害青年陷阱”<sup>[2]</sup>（第55页）“跳舞之祸害甚于毒蛇猛兽，我国抗战胜利后，内政方针第一件事须禁绝跳舞”。<sup>[2]</sup>（第61页）

人生活在民俗文化之中，总有其选择民俗的态度，而民俗态度往往是他人生观念的折射。陈嘉庚先生伟大而崇高的人格，使他能从世间习俗中很快分辨出良俗与陋俗。尽管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例如他对旗袍和跳舞的态度），但是这丝毫没有减损他精神的超绝和人格的伟大。他利用科学教育对良俗的传承，对陋俗的批判，对外来新民俗的有选择的吸收，对本国旧时代陋俗的扬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世纪厦门社会的风俗移易与陈嘉庚的个人努力不无直接关系。

总之，民俗文化是陈嘉庚人生的摇篮，它培养了这位中国伟大公民的平民意识、民间意识、民俗意识和从善如流的美德。民俗文化塑造了陈嘉庚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嘉庚先生虽然不是一个民俗学家，但是他的民俗观念却为我们的民俗研究提供了一则弥足珍贵的文化案例。

#### 参考文献：

- [1] 钟敬文.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22.  
[2]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M]. 新加坡版，1993.（集美学校委员会同年翻印本）.